

论巴渝文化十大系列

熊 笃

(重庆商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巴渝文化源远流长,巫山原始文化,巴族巴国文化,三国文化,丰都鬼文化,巴渝竹枝词民间文艺,大足石刻艺术,南宋抗元军事文化,明玉珍大夏文化,辛亥革命文化,陪都及红岩文化等构成了巴渝文化的完整系列。

关键词:巴渝文化;系列;论述

中图分类号:G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5831(2001)04-0038-08

On Ten Series of Bayu Culture

XIONG Du

(Chongqing Institute of Commerce, Chongqing 400067, China)

Abstract: Bayu culture goes back to ancient times. The whole series of Bayu culture includes the original culture of Wushan, Baguo culture of Ba nation, the Three Kingdoms culture, the ghost culture of Fengdu, the folk literature and art of Bayu Zhuzhu Ci, the carved stone art of Dazhu, the military culture of resisting the aggressors in the late of the Song Dynasty, the Daxia culture of Yuzhen in the Ming Dynasty, the culture of the Revolution of 1911, the culture of an alternate capital and the culture of Hongyan.

Key words: Bayu culture; series; introduction

“巴渝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其具体内涵经过认真系统梳理,主要包括以下十大系列。

一、巫山原始文化

(一)龙骨坡文化——中国人类最早的发祥地之一

1985年10月13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在重庆巫山县大溪龙骨坡发掘出更新世早期的巫山人化石。据古地磁测定,是距今201—204万年前的巫山人,同地区发现了一大批石器制品和65—80万年前的早期智人化石。这一重大发现震动了国际学术界,打破了西方学者认为东非奥杜威峡谷200万年前的原始能人进化到160万年至50万年前的原始智人,再到10万年前迁移到北京的神话说法(1992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著《远古以来的人类生命线》),1995年美国《科学新闻》以《人类祖先在中国》为题评论道:“由于龙骨坡的这个新发现,将改写人类演化的理论……。”我国著名考古学家裴文中教授(北京猿人头盖骨的第一个发现者)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就曾预言:“北京猿人的祖先在三峡”。著名历史考古学家贾兰坡先生认为:巫山人的发现,“是亚洲的金牌”。参加发掘龙骨坡的考古学家黄万波教授认为:龙骨坡出土的砸击石锤,凸刃砍砸器和捣碎器等,“代表了200万年前一种混沌初开的石器工业。”(《从巫山龙骨坡文化探

索人类的起源》)。

(二)举世闻名的史前文化——大溪文化

1958年,1975—1976年,四川省长江三峡水库文物调查队在巫山县瞿唐峡东口长江南岸的三级台地,前后三次发掘出公元前4400年至前3300年间远古墓葬207座,出土文物1700余件(见《考古》1959年第4期,《文物》1961年第11期,《考古学报》1981年第4期对三峡、大溪的发掘报告),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长江三峡队1994年又在此清理出古墓3座。这些墓葬上下重叠、墓坑竖穴密列,皆单人葬。死者皆头朝南向,有仰身直肢、仰身屈肢、侧身屈肢、俯身屈肢等葬式。女性墓多于男性墓,表明是母系氏族期的公墓。1700多件墓葬文物,多为打制石器生产工具,如石斧、石锛、石锄、石凿、石铲等,说明已普遍采用了对石料的切割和钻孔技术以及以农业为主的生产方式。其次还有骨制的针、锥、凿、匕、斧、纺轮等工具,说明当时已有纺织业。还有一批陶制生活用品,红陶为主,黑、灰陶次之,彩陶最少,饰纹有戳印纹、刻纹,如釜、鼎、豆、盘、碗、盆、钵、簋、罐、瓶、壶、杯等。此外还有一批石镯、象牙镯、玉杯、玉璜、玉玦、蚌珠等佩饰。玉器边沿多呈锯齿状图形,最具特色,表明大溪先民不同凡响的审美观念。不少墓中用鱼随葬,这在中国新石器时代极为罕见,说明虽以农业为主,但渔猎仍是峡江的重

收稿日期:2001-09-10

作者简介:熊笃(1944—),男,重庆长寿人,重庆商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学及巴渝文化研究。

要生产方式。

(三) 巫文化及巫载文化

《山海经·大荒南经》第十五载：“有巫山者，西有黄鸟，帝药，八斋，黄鸟于巫山，司此玄蛇。”晋人郭璞注“帝药八斋”皆“天帝神仙之药在此也。”同书《大荒西经》第十六：“有灵山，巫咸、巫即、巫盼、巫彭、巫姑、巫真、巫抵、巫谢、巫罗十五，从此升降，百药爰在。”袁珂《山海经校注》主为“灵、巫、古本一字……因疑此灵山即彼巫山也。”同书《海内西经》第十一又云：“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巫相，夹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郭璞注末句云：“为距却死气、求生。”按巫彭、巫咸等皆为远古传说的神医和占卜巫官，所谓“天帝神仙之药”即是丹砂，故巫山远古又称丹山。宋人罗泌《路史·后记》十三注《山海经·海内南经》云：“丹山，即今巫山。”可见“灵山”、“丹山”均指巫山，其地盛产丹砂，不仅可作颜料，而且可作医药，被原始先民视为神仙不死之药，能使人长生不老，起死回生。

《山海经·大荒南经》又载：“有载民之国，帝舜生无淫，降裁处，是谓巫载民。巫载盼处，食谷。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穡，食也。爰有歌舞之鸟，鸾鸟自歌，凤鸟自舞；爰有百兽，相群爰处。百谷所聚。”据历史学家任乃强先生考证：巫载国位于瞿塘峡东口（大溪口）与巫溪西口（巫溪口）之间的宽阔地带，并与大宁河谷与大溪河谷紧紧相连。此一地带即是“巫载文化区”（《四川上古史新探》）。帝舜派其子无淫来治巫载国，正说明在此之前，巫载国早已存在。其民何以不纺织而有衣穿，不耕种而有谷食？可能与该地盛产丹砂和盐泉有关，他们可以用丹砂和盐与外地部落换取布匹和谷米，透露出原始社会该地的商贸信息。传说十巫中“巫姑”就是盐水女神。按《通典》卷187载：盐水即夷陵郡（宜昌）巴山县清江水，一名夷水，又名盐水，今湖北长阳县西清江河畔有盐水温泉，又名盐水。又巫山巫溪两县古代也是盛产盐泉之地。《后汉书·西南夷传》也记载白虎巴人祖先廆君西迁从夷水至盐阳，射杀了盐水女神（其实就是母系氏族集团首领），君临夷城。唐李贤注：“今施州清江县水一名盐水。”

巫，本是原始社会的知识阶层，不仅司神、占卜，而且行医制药，制盐，通天文地理，能歌善舞。后代的医、优、道教等皆源出“巫”的演变，故史前的巫文化实为后世宗教、医药、文艺、星象占卜等众多子文化的源头。而巫山乃巫文化的发祥地，故著名史学家俞超伟教授在《楚文化考古大事记序》中认为楚文化的摇篮就是从鄂西巫文化开始的。

此外还有市区南岸的涂山大禹文化，是大禹治水娶涂山氏，四日离家，“三过家门而不入”之地。《华阳国志》古代地理史志都有记载，历代碑、赋、诗、文多有记述，涂后生子夏启，至今仍有关夫滩、诞（弹）子石、虎乳溪、涂洞等地名传说。

二、巴族巴国文化

(一) 巴族起源于伏羲四、五代子孙

《山海经·大荒海内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这是先秦最早记述巴人的文献史料，太皞即“三皇”之首伏羲，巴人是伏羲第四代

子孙。宋人罗泌《路史·后记》卷一则云：“伏羲生咸鸟，咸鸟生乘厘，是司水土、生后照，后照生顾相，（降）处于巴。”则巴人是伏羲第五代子孙。按南朝宋人裴驷对《史记·五帝本纪》的《集解》，认为伏羲子孙衰落，为炎帝神农所取代，神农子孙衰落，轩辕氏黄帝方兴，则从伏羲至黄帝至少也有五代人，那么巴人的始祖后照或顾相至少应与黄帝同时或更早。按古史界一般推断，黄帝约公元前2550年，距今4550年，则巴族之始也应在此时或更早。据《山海经·海内南经》载：“夏后启之巨曰孟涂，是司神于巴。人请讼于孟涂之所，其衣有血者乃执之，是清生居山上，在丹山西。”又《竹书纪年》卷三：“启八年，帝使孟涂如巴莅讼。”光绪《巫山县志》卷十七《坛庙志》也载：“孟涂祠在县南巫山下。”这说明巴族起源于巫山，直到夏启时仍未迁徙。夏启是结束原始社会“公天下”而代之以奴隶制“家天下”之始，他派大臣孟涂来巴主持刑狱诉讼，凡衣服上有血迹的人就拘捕入狱。说明巴族此时也进入私有制的奴隶社会，财产纷争甚烈，通过刑狱强制解决正是行使国家机器的职能。而孟涂乃三涂氏之首长，夏启之母涂山氏即三涂之酋子（何光岳《南蛮源流史》），则孟涂乃夏启之母党重臣，此后巴人分三支走出巫山。

(二) 龙蛇巴人

龙蛇巴人以蛇为图腾，《说文》：“巴，虫也，或曰象蛇，象形。”“巴”字即“蛇”字的象形文字。龙蛇巴人走出巫山东迁至洞庭湖畔，时为夏朝第五代君主帝相之时，被夏朝后羿打败。占地理书《得阳记》云：“后羿斩巴蛇于洞庭，委其骨成丘。”元和郡县志谓“委其骨若陵，故曰巴陵。”今岳阳市古称巴丘、巴陵，即缘此故。龙蛇巴人余部遂迁徙到汉水中游，建立巴方方国。大约公元前1220年，商朝殷高宗武丁南伐巴方（见《殷契粹编》230条甲骨卜辞），龙蛇巴人又西迁至大巴山容渠（今四川渠县一带），后来继续西迁至阆中一带，与另一支巴人的后裔賁族混居于今南充地区至陕西汉中川北地区。

(三) 鱼鳖巴人

以鱼为图腾，分鱼复部和鳖灵部，“鱼腹”，在先秦《逸周书·王会》已出现此地名，秦置巴郡鱼腹县（今奉节县东南二里有鱼腹浦），鱼复，本因鱼鳧（鱼鹰）而得名。该部族走出巫山经宜宾至川西都江堰，后在广汉建立鱼鳧蜀王朝，约在商朝后期扬雄《蜀王本纪》：“蜀王之先，名蚕丛、柏蔑、鱼鳧、蒲泽，开明。”李白《蜀道难》：“蚕丛及鱼鳧，开国何茫然。”今广汉三星堆发掘的古土城遗址即其王宫，有饰有鱼纹的王者像，其它文物也多有鱼纹图案。另一部族为鳖灵部，《蜀王本纪》和《华阳国志》均载鳖灵为“荆人”，是因战国时期荆楚已侵占巴国黔中之地，故沦陷的巴人亦称“荆人”。鳖灵死后，尸体沿江而逆漂至川西郫县（一说至汶山）复活，蜀王杜宇拜为丞相，以其治水有功，禅让王位于之，鳖灵于是建立开明蜀王朝，约当公元前666年，号曰丛帝，历十二世，于前316年为秦国所灭。

(四) 白虎巴人

始祖为廆君。《世本·氏姓篇》载：“廆君之先，故出巫诞。”说明源出巫山诞部落。“廆”即“灵”，灵即“巫”。该部巴人在夏朝中期走出巫山，东迁至鄂西长阳县清江南岸落钟离山。

《世本》称：“廩君名务相，姓巴，与樊氏、相氏、邦氏凡五姓。”《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所载亦同：谓五姓约定以“投剑中石穴”和造“土船能浮”者为君。结果巴氏子务相“独中”“独浮”，“因共立之，是为廩君。”廩君率部落西迁至夷水打败盐水女神，到施恩一带筑夷城立巴国。“廩君死，魂魄世为白虎。”（同前书）说明以白虎为图腾。商朝武丁伐巴方，白虎巴人西迁定都于枳（涪陵），以平都（丰都）为别都（《水经注·江水》）。《华阳国志》说巴国“其先王陵墓多在枳”，被1972年在涪陵小田溪考古发掘出巴人祖先群墓所证实。后因慑于楚国侵略，又西迁至江州（重庆）。《华阳国志》云：“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武王既克殷，以其宗姬封于巴，爵之以子。”故从周初封巴子国，巴王已由姬姓充当了。公元前316年秦惠王遣张仪、司马错伐蜀，灭蜀国、巴国。巴国从商朝中后期夷城立国算起至灭国，约有900多年历史。

巴国文化灿烂辉煌：三峡大坝工程期间，出土文物已有1万多件，大部分都是巴国时期的文物，经考古专家鉴定各种兵器的铸造质量，约与《考工记》所载中原同期的冶炼技术水平相当；巴县冬笋坝出土的巴国墓葬品各种漆器制作精细，奇巧美观，说明巴国制漆工艺水平之高（至今城口大漆仍居中国五大名漆之首，万县、云阳、酉阳等地则是世界最大的桐油产地）；巫山、巫溪、云阳等地在巴国时已学会多种煮盐法，除煮盐泉外，用木桶隔开淡水汲水底盐泉煮盐，也是巴人最早发明的；农业上，巴国水稻的种植技术和优良品种已达到很高水平，优质稻当时可制作成楚宫嫔妃的高级化妆粉，后来巴郡水稻成为上供朝廷的“御米”；巴乡清酒使秦昭王甘愿用一对黄龙玉饰换取清酒一杯（《后汉书·南蛮西南夷传》），说明酿酒技术高超，已成为驰名中原的优质名牌；巴国枸酱可以健胃通气，直至汉初已畅销广东、古越南，汉武帝吃了认为“味美与肉何异”；织布也很精美，以致秦灭巴后，还规定巴人以布代赋税（同上书）；在民俗方面，巴人发明了船棺葬、石室墓葬等丧葬形式（酉、秀、黔、彭及三峡地带均有文物出土），还发明竹木“干栏”居室，从市博物馆藏巴人簪子上的房屋图案可证，后代的吊角楼是其遗传。

特别在艺术方面，巴人创造了举世闻名、威武雄壮的巴渝乐舞。《华阳国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著乎《尚书》。巴师勇锐，歌舞以凌殷人，前徒倒戈，故世称之为：武王伐纣，前歌后舞也。”后刘劭为汉王时，又征巴人攻打三秦，巴人“天性劲勇，初为汉先锋，陷阵，锐气喜舞，帝善之，曰：‘此武王伐纣之歌也。’乃令乐人习学之，今所谓巴渝舞也。”（同上）。周灭商后，武王命周公主持乐人将巴渝舞改编成盛大的宫廷歌舞《大武舞》（见《白虎通·礼乐》）；刘邦建汉朝后，又一次使巴渝舞进入汉朝宫廷，即《盐铁论·刺权篇》，所谓“鸣鼓巴俞作于堂下。”直到唐初修《晋书·乐志》还具体记载了巴渝舞有《予渝本歌曲》、《安弩渝本歌曲》、《安昭本歌曲》、《行辞本歌曲》四篇，谓“其辞既古，莫能晓其句度。魏初，乃使军谋祭酒王粲改创其词。”《隋书·音乐志》载九部乐，第一部清乐，就包括鞞舞在内，“牟弘请存鞞、铎、巾、拂等四舞……按汉魏以来并施于宴饷，鞞舞，汉巴渝舞也。”隋文帝曰：“其声音节奏及舞悉依其旧，惟舞

人不须提鞞拂等。”九部乐中，“清乐其始，即清商三调是也，并汉末旧曲。”隋文帝听之，善其节奏曰：“此华夏正声也。”其余八部皆外来“胡夷”之乐。《旧唐书·音乐志》谓唐“高祖登极之后，享宴因隋旧制，用九部之乐。”又谓清商乐：“隋室以来，日益沦缺。武太后时犹存六十三曲，今其辞存者，惟有白雪、公莫舞、巴渝……等三十二曲。”可见至唐五代，巴渝乐犹存。

巴国时期的礼器乐器与中原相比毫不逊色，如巫山大昌古镇出土的“商式铜尊”，说明中原文化在商代已与巴国相通；酉阳龙潭镇出土的曾侯乙钟是周代青铜制品；黔江中塘乡出土的蚕纹铜铎和变形鱼铜铎，是春秋战国时的军乐器；涪陵小田溪出土的巴王墓葬编钟14枚和黔江濯西乡、云阳龙洞乡、巫溪建楼乡等地都出土过不少战国时期的编钟，此外还有万县甘宁乡出土的巴国军中打击乐器鞞于等。

巴国时期流行的通俗民歌在战国时曾经传入楚国郢都，深受楚人欢迎，趋之若鹜。《文选·宋玉对楚王问》：“客有歌于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国中属而和之者数千人。”

三、三国文化

（一）诸葛亮夔州八阵图

分水八阵和旱八阵，水八阵在今奉节县城东一公里长江北岸沙滩上。明正德《夔州府志》载：“其阵聚卵石为主，作八八六十四堆，外复列二十四堆，堆高五六尺，相距八尺许，广如其高。”但今已淹没。旱八阵位于奉节县城以东草堂河上游，其阵为犬牙交错的山形，四周沟壑纵横。八阵图遗迹在全国有夔州、新都、沔阳、南市四处，今唯存前二处，而又以奉节保存最全。八阵图在古代兵法中倍受重视，唐李筌《太白阴经》，宋编《武经七书·唐李问对》，明编《武备志》等兵书均有记述，宋赵汴有《八阵图集记》，明蓝章有《刻八阵图旧序》，历代文人咏八阵图的诗赋不可胜数。《三国演义》第84回“孔明巧布八阵图”更虚构了陆逊困阵的生动故事，家喻户晓。

（二）永安宫大成殿

据《三国志·先主传》载，刘备征吴惨败退回永安宫召诸葛亮托孤。其遗址在今奉节县师范学校内。永安宫历经六朝，至唐代已荡然无存。元、明时再兴建先主庙、大成殿、永安亭等，今大成殿尚存有刘备、孔明等塑像。

（三）白帝城

在奉节瞿塘峡西口北岸，是西汉末年自号白帝子。在蜀割据称帝的公孙述设防筑的城，东汉初始建白帝庙祠公孙述。直到明正德间，四川巡抚林俊斥公孙述誓号称帝为叛逆，透捣毁其塑像，改立祀江神、土神及汉将马援的“三功祠”。嘉靖十二年（1533）巡抚朱廷立和按察司副使张俭又改祠刘备、诸葛亮，更名为义正祠，四年后巡抚段锦又增塑关羽、张飞像，改称明良殿。今白帝城建筑多为明清重修。集隋至清碑刻80余通，成为著名的三国文化旅游景点。

（四）甘夫人墓

奉节夔州宾馆院内，光绪《奉节县志》记载：“汉昭烈皇后墓在府治内，墓碑上有‘汉昭烈甘皇后之墓’八个阴文汉隶。”

（五）张桓侯庙

在云阳县城对岸的飞凤山麓,始建于蜀汉末年,后经宋、元、明、清代代修葺扩建,史载:“昭烈章武元年,(张飞)移发阆中,军会江州,值张达之变。”“侯既被害,两贼(范疆、张达)函首东下。蜀师问罪,吴人归之媾和,旅瘞于此。”当地民间传说:“飞之头被掷江中,顺流东下至云阳,被一渔翁捞起葬于飞凤山下并立庙祭祀,故历来有“身葬阆中,头葬云阳”之说。该庙气势雄伟,集汉唐明清石碑、木刻、字画 600 余通。享有“名山古刹,蔚为碑藪”、“文藻胜地”之美誉。

(六) 阳关

在涪陵市西与长寿交界的黄草峡口处,今名城门洞;一说即今涪陵城西 7 公里的龟龙关,是巴国御楚的三关之一。三国蜀汉车骑将军邓芝为江州都督时曾治此防守,其关外有赤甲戍。宋徽宗大观元年(1107),阳关附近曾出土张飞的斗牛铭和印章。

(七) 张飞岷石刻

在彭水县太原乡光村通往石柱公路西侧 3 公里处立有一石,上有人工雕凿六行阴刻符号,不类甲骨文、钟鼎文和符咒,传说系张飞手指刻成,故其地名叫“张飞岷”。

(八) 严颜墓

在今忠县乌杨镇将军村,颇为三国时刘璋属下巴郡(今重庆)太守,被张飞破城后生擒,宁死不屈,称:“只有断头将军,无有投降将军。”张飞感其壮烈,义释之。其为忠县人,故死后葬此。明万历年间忠州知州尹瑜重修;清道光五年知州吴友澂再重修。清忠县熊文稷有《谒严将军墓》诗,今墓已无存。

(九) 甘宁墓

甘宁是三国东吴大将,巴郡临江(今忠县)天窰乡甘家坝人。曾屡立战功,《三国志》有传。建安二十年(215)合肥之战战死,归葬故里。今万县甘宁乡贯凤村有甘宁墓。

(十) 三国墓葬

1981 年 5 月,四川省文物考古队在忠县涂井乡红赤村发掘三国蜀汉墓 15 座,出土文物 331 件,铜钱 3259 枚。其中 5 号墓保存最完整,墓内有陶制的马夫、马车、水井、盐井、池塘、田土、鸡犬禽兽、乐队舞队、庖房各种食品等,俨然是一户钟鸣鼎食之家的立体风俗图画。

(十一) 李严第二次筑江州城

蜀后主建兴二年(226)都护李严由永安(奉节)移镇江州(重庆),为防止曹魏和东吴水路进攻,第二次筑江州城,周长 16 里,《华阳国志》有记载。李严曾拟打通鹅岭,使两江水相通,成四面环水,丞相诸葛亮未批准,事未成。

四、丰都鬼文化

重庆丰都是鬼文化的集大成之地。本来从殷商时期,信鬼的风俗就很普遍,但作为鬼文化,尚不成体系。道教产生之后,东汉和帝刘肇皇后的曾祖父阴长生跟马明生学炼丹,于延光元年(122)在平都山(丰都原称平都)据说白日升仙。东汉末王方平也弃官到平都山修道,于三国魏明帝青龙元年(233)据说也腾祥云升仙而去(以上见南宋范成大《吴船录》记载)。后代对此传闻日广,把这两人事迹简称“阴、王”,渐渐讹为“阴间之王”

的起源。西晋开始,佛教就在此山建庙,唐代道教又在山上建“仙都观”,宋代改为“景德观”,明代则称“阎罗殿”。清康熙年间重建,改称“天子殿”。丰都历代素有“鬼国”、“鬼国京城”、“冥府”、“阴曹地府”之称,闻名于中外。平都山又称“名山”,是道、佛、鬼文化杂揉的名胜之地。原名通仙桥后改为奈何桥,是通往阴间阎王天子殿和十八层地狱的必经之路,民间传说过桥时,善人安步得道,恶人必被打下血河饲虫喂蛇。上殿正中塑有阴天子阎王像,高 3 米多,着皇冠龙袍玉带,宫女左右侍立,两旁为“文武六曹”,身后是阎王皇后坐像。中殿有“四大判官”和“十大阴帅”,即日游神、夜游神,黄蜂、豹尾、鸟嘴、鱼鳃、九常、牛头、马弁、鬼王,身高均 3 米以上。下殿为两厢长廊,分为东西 18 层地狱,塑有孽鬼惨遭上刀山、下油锅、遭雷打、挨炮烙、锯尸、剥皮等酷刑,阴森惨烈之极。大殿右侧有象征 33 重天的 33 级石梯通向南天门,再经凌霄殿上行到漆黑的鬼门关,其上有望乡台,据说在此焚香哭奠便可见到死去的父母亲友。经明清戏曲小说的描写渲染,丰都鬼城俨然成为因果报应、决定人生死轮回的权威裁判所,与阳间相对应的阴间世界。

从唐代开始即流传的“丰都香会”,每年农历正月十五至清明结束,历时一个半月,四面八方州县香民皆来此上山逐一祭拜鬼神,短则拜三天,长则达半月,许愿还愿,求神问签,忏悔赎罪等,流波遍及全国及日本东南亚等地。

农历三月三又盛行庙会节,是阴天子娶亲,城隍出巡的吉日,比肩接踵的善男信女皆到丰都庙会上跪拜烧香许愿,现在仍兴庙会日,借以办招商引资和商品展销等活动。

民间死丧做道场和为驱邪跳端公、演傩戏等习俗或民间文艺,都是由鬼文化派生而来。丰都鬼城则是集历代鬼文化之大成,而又是佛、道、巫教和儒教混台杂揉的渊藪。

五、巴渝竹枝词等民间文艺

竹枝词发源于巴渝。《华阳国志·补志》“巴渠县”条载:“其民俗聚会则击鼓,踏木牙,唱竹枝歌以为乐。”西晋左思《魏都赋》云“明发而耀歌。”唐李善注引魏何晏曰:“巴子讴歌,相引牵连手而跳歌也。”此即竹枝歌,至少魏晋时已流传,其起源当更早。中唐诗人顾况、李涉、白居易、刘禹锡等均有竹枝词传世。元和六年(881)李涉贬峡州司仓参军,有竹枝词 5 首。十四年(819)白居易贬忠州刺史,曾作竹枝词 4 首。长庆二年(822)刘禹锡贬夔州刺史共作竹枝词 11 首,其序云:“里中儿联歌竹板,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卒章激讦如吴声,……昔屈原居沅湘间,其民迎神,词多鄙陋,乃为作《九歌》,至于今荆楚歌舞之。故余亦作竹枝九篇,俾善歌者随之,附于末,后之聆巴歎,知变风之自焉。”自刘禹锡加工改造示范后,原本是民歌的竹枝歌得到升华,开始成为文人普遍拟作的一种新鲜诗体,多用比兴双关、俚俗而幽默,率真而活泼,象七绝而多重拗格。宋黄庭坚《山谷内集》云:“竹枝词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宋元明清诗人拟作竹枝词代不乏人。连北方,杭州等地未到巴渝的诗人都拟作。很多书法家书写竹枝词为条幅,奉节县征辑“白帝城竹枝词碑园”刻成竹枝词众多石碑,人称“三峡第一碑林”。直至近代,巴渝沿

江地区民间仍盛行集辞、声、乐、舞为一体的竹枝词演唱,成为最具巴渝风情特色的乐舞诗萃。

此外还有盛行几百年的川剧、荷叶、清音等地方戏曲,铜梁龙舞、秀山花灯、綦江版画、川江号子等民间文艺,也都异彩纷呈,富有浓郁的地域文化特色。

六、世界文化遗存:大足石刻艺术

大足石刻总计造像75处,雕像5万余尊,被列为“世界文化遗存”,尤以北山、宝顶山最著名。

(一)北山石刻

晚唐僖宗、昭宗时,昌元县(今重庆荣昌)令韦君靖在军阀混战、黄巢起义、僖宗奔蜀、四川战乱中,招募义兵,讨逆靖乱,收复普州(安岳)、合州(合川),先后击败韩秀升、陈敬宣等叛将,先后以功升为普州、合州、昌州刺史,充昌普渝合四州都指挥静南军使,治所大足。史载其“重仁义,轻金帛,怜孤恤老,济弱扶危”。在战乱中广大民众乞望神佛保佑,而君靖亦受佛教影响,遂于僖宗乾符六年至昭宗光化元年(879—898),一面屯兵积粮,一面招能工巧匠在北山刻造佛像。死后,刻佛造像继续不断,经五代十国至宋代,历时250多年,完成了北山石刻。

北山石刻现存290龛窟,4600尊造像,主要为观音造像,如释迦牟尼、阿难迦叶、千手观音、水月观音、媚态观音、数珠手观音、日月观音、普贤观音、文殊菩萨、如意珠观音、玉印观音、四大天王、八大金刚、三世佛、阿弥陀佛、多宝佛、珂梨谛母、摩利支天女、维摩居士、孔雀明王、西域禅师坐化塔、弥勒下生经变图、地藏变相图、观音变相图、观无量寿佛经变像、三品九生众生像、佛讲十六观、地藏游地府、转轮经藏、多宝塔、方丈堂以及韦君靖碑、古文孝经碑、蔡京书赵懿简公神道碑等。

(二)宝顶山石刻

南宋淳熙至淳祐年间(1179—1249),大足僧人赵凤智师承广汉弥彦镇密宗祖师柳本尊学道,回大足后,用毕生精力70年之久,凿造宝顶石刻,纵横五里,多达13处,造像近万尊。以宝顶山为中心,还有龙潭、龙头山、对面湖等处,构成了最具特色的庞大的密宗道场。有护法神群像、六通大神、六道轮回图、广大宝楼阁图、华严三圣图、舍利塔、毗卢庵、千手观音、释迦佛涅槃、释迦诞生图、父母恩重经变像(七组故事)、云雷音图、大方佛报恩经变像(一序十二组佛祖故事)、观无量寿佛经变像、六耗图、地狱变像(地藏王、十殿阎罗现报司、速报司十二殿、十八层地狱)、柳本尊行化图、十大明王、正觉像、刘旼人碑、圆觉道场、牧牛正觉道场等。大佛湾规模最大,石刻长约500米,崖高15—30米,摩崖造像刻在东南北三面石壁上和石窟中,共计31幅大型雕像,碑刻7通,题记17则,舍利塔2座。其中造像设计之宏伟精巧,匪夷所思,令人叹为观止,如释迦涅槃卧佛长达31米,表现其涅槃境界人称其“身在大足,脚踏泸州,手摸巴县。”千手观音占崖面88平米,有1007只手,如孔雀开屏,层层叠叠,有规律而不板滞,在世界上都是唯一的。父母恩重经变像中有“怀胎守护恩”、“临产受苦恩”、“生子忘忧恩”、“推干就湿恩”、“洗濯不尽恩”、“远行思念恩”、“哺乳不尽恩”、“为造恶业恩”、“究竟怜悯恩”等,像一部孝子故事连环画,贴近生活人

情而又渗透了儒家伦理精神。圆觉道场的大狮子长6米,俯卧式、栩栩如生,象征佛说法为狮子吼。里面说法画面结构复杂,塑造出庄严肃穆的典型环境,文殊拖塔像,塔高1.8米,重800斤,文殊悬臂离身2米,里面设有钢筋,却托了800年不坠落,令人惊叹不已。

重庆市除大足石刻外,还有潼南大佛寺摩崖石刻大佛,云阳下岩寺唐宋摩崖石刻,合川钓鱼城护国寺摩崖石刻卧佛和千佛岩2772尊石刻佛像;缙云山香炉峰下北山石刻雕像;北温泉石刻园中的盘龙塔五层整块石刻;南岸老君洞三清殿后石壁有明代石刻浮雕等等。

七、宋末抗元军事文化

合川钓鱼城:据《宋史》、《续通鉴》记载:1234年,蒙古灭金之后即进攻四川,两年后陷成都,南宋理宗嘉熙二年(1238),重庆知府彭大雅为抵御蒙古侵犯,第三次用石基砖墙筑城,立四块大石于四门之上(见宋邵桂子《霄丹胜语》)。元初胡三省注《资治通鉴》云:“我朝自绍定失蜀,彭大雅遂城渝为治府,支持西蜀且四十年。”淳祐二年(1242)余玠任四川制置使,治重庆,接受遵义人冉玘冉璞兄弟建议,在川东各地建筑山城防御体系,尤以合川钓鱼城为最。1243年,钓鱼城宋将王坚知合州,率17万军民迁移山上,筑城蓄水,耕地屯粮。宝祐二年(1258),成吉思汗之孙,拖雷之子蒙哥大汗亲帅主力三路入川,年底抵钓鱼城下。从开庆元年(1259)二月攻城开战,至七月,王坚击退蒙古军多次进攻,击毙蒙古大将汪德臣,又用石炮重伤蒙哥汗,当晚回营身亡。这一重创,使进攻鄂州的忽必烈(蒙哥之弟)立即撤军回燕京与其弟阿速不哥争帝位。这影响了蒙古铁蹄征服欧洲的战局,钓鱼城被西方史学家称为“上帝折鞭处”“东方的麦加城”而享誉全球。景定四年(1263)张珪任合州太守,忽必烈派重兵攻钓鱼城不下,转攻川东周固州县以孤立钓鱼城。咸淳二年,张珪出奇兵收复大良平(广安)、虎相山;1273年,张珪在嘉陵江渠江口设疑兵,偷渡平阳滩尽焚元军粮草船场,斩元军统制周虎等。1275年张珪任四川制置使兼知重庆府,多次击败元军,解重庆之围,又出奇兵攻克泸州、涪陵,拔忠县石门,俘获元军将士百多人,攻破十八寨,解大宁(巫溪)之围。1278年,元军四面包围重庆,张珪坚守,拒绝劝降,击伤元将汪良臣,后因部将赵安开门降元,元军涌入城中,张珪犹坚持巷战,杀到江边夺船逃至涪陵被俘,在押解赴京途中自杀殉国。钓鱼城之战坚持长达36年,成为世界防御史上的空前奇迹。

钓鱼城历史文物陈列馆内今有于玠、冉玘、王坚、张珪等英雄塑像和历代碑记,护国寺山门有明代10米高石坊,上刻“独钓中原”四个大字。还有宋代摩崖卧佛身长3.6丈。现存宋代城墙6.5公里,城门七道及外城、内城、一字城等遗址,还有水师码头、演武场、炮台、敌楼、王坚纪功碑、天池、上天梯、皇城等古战场遗迹。成为中外游人凭吊的历史著名胜地。巴渝南宋抗元军事文化遗址除钓鱼城外,还有涪陵三寨、云阳县石华、南川龙岩城、忠县皇化城、万县天子城、巫山天赐城等十多处,都是坚持十余年的抗元军事要寨。与钓鱼城形成巴渝抗元军事文化遗址长廊而彪炳千秋。

八、明玉珍大夏国文化

元朝末年,颍州红巾军起义,韩山童、刘福通率义军向东向北发展,徐寿辉、彭莹玉率义军向西攻占湖北蕲、黄,建立天完政权。随州(今湖北随县)人明玉珍于1352年率千人乡兵投红巾军,徐寿辉任统军元帅镇守沔阳,与元将哈林秃大战皆捷。后奉命率船队溯江到巫峡筹粮,救济沔阳灾民,以功升为奉国上将军统兵都元帅。至正十七年(1357)明玉珍奉命西征攻克夔州万州,溯流而上攻重庆,生擒四川省左丞哈麻秃,重庆百姓欢迎义军入城,义军军纪严明,史称“禁侵掠,市肆晏然,降者相继”。西上涪江击溃并改编青巾军,南下连克泸州、叙南、普州等地,升为陇蜀右丞相。复攻克成都、嘉定,生擒元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等,占据全川。至正二十年夏(1360),陈友谅杀徐寿辉自立为汉王,明玉珍亦在重庆称陇蜀王。二十二年(1362)三月,称帝于重庆,国号大夏,改元天统,定都重庆。仿周制设六卿,任刘桢为丞相,任命百官,置翰林院,开科取士,去佛、道二教,专奉明教。其疆域北自汉中,东据夔门,南达播州(今遵义),曾攻进云南昆明。分国为八道,设府、州、县三级。废除元朝一切徭役,实行十分取一税制,实施了许多兴利除弊措施,经济文化均出现恢复上升局面。明初方孝儒评说:“夏主幸政,躬行俭约,兴文教,辟异端,禁侵掠,薄税敛,一方咸赖小康焉。”天统四年(1366)玉珍病歿,子明升十岁继位,改元开熙。从此开始内乱,丞相万胜杀知院张文炳,内府舍人明昭又杀万胜,保宁镇守吴友仁叛夏,致书丞相戴寿请诛明昭,明升被迫杀明昭。开熙五年,即明洪武四年(1371),明太祖派汤和、廖永忠率兵入川,明升投降,后被流放到朝鲜。1982年在重庆江北城织布厂发掘出明玉珍墓——大夏睿陵。长方形竖穴石坑墓,坑长5千米,宽3.5米、深2—3米。填土九层,上为木炭沙石层,中为三合土层,下为木炭层。有榿木外椁和柏木内棺各一具。墓碑上刻“大夏太祖钦文昭武皇帝玄宫碑”,碑文篆书,24行,行47字,记载其生平事迹,可补《明史》之不足。随葬有金杯一只,银锭二枚,明器与丝织品数件。表现出大夏国尚简朴节俭的作风。市政府在此建有明玉珍纪念馆。

重庆师院图书馆已故副馆员赵馥有《明玉珍集校注》稿本,至今尚未出版。

九、辛亥革命文化

(一) 邹容及其《革命军》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威丹),重庆渝中区人,1901夏,在成都官费留日考试,因思想激进被黜。翌年以自费东渡日本,在东京神田区同文书院留学。因参与留日学生反清活动,并拒打清政府驻日学监姚文甫,被逐回国,在上海参加拒俄运动,发起组织“中国学生同盟会”,写成两万字的《革命军》,揭露清政府的专制腐败,倡言“永脱满洲之羁绊,尽复所失之权利”,“全我天赋平等自由之位置”,“建立中华共和国”。章炳麟为之作序,称为“义师先声”,章士钊主笔的《苏报》誉之为“国民教育之第一教科书”。该书出版后举国震动,清廷恐慌。《苏报》被查封,章炳麟等人被捕入租界狱。邹容闻讯,奋起投狱,愿与章氏共患难。被判刑2年,罚作租界苦工,折磨致病而死,年仅20

岁。1912年2月,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名义追赠邹容为大将军。吴玉章题诗赞云:“少年壮志扫胡尘,叱咤风云‘革命军’,号角一声惊睡梦,英雄四起挽沉沦。”

1944年重庆市党政联席会议决定将洪家院子至巷坪街邹家祠堂地段改名为邹容路,在南区公园修建“邹容烈士纪念碑”。邹容好友又积极在杨家坪创办“邹容小学”,后改名育才中学。

(二) 宋育仁办《渝报》和卞小吾办《重庆日报》

宋育仁,四川富顺人,曾任英、法、意、比四国公使参赞,巴蜀地区戊戌变法的代表人物。1897年10月他在重庆创办《渝报》,为四川报刊之始。共办15期,每期有“渝旨恭录及奏折摘要”、“译文摘录”、“报局新论时务”、“中外近闻分录”、“川省、渝城物价表”五个栏目。促进了巴蜀地区思想解放。后因戊戌变法失败亦停刊。

卞小吾,江津人。16岁中秀才,赴重庆与杨庶堪等人组织“游想会”议论针砭时政。1902年到上海参加蔡元培组织的爱国学社,曾三次到狱中探望邹容、章炳麟。1904年2月回重庆变卖祖传家产得白银6000余两,并大批购买《警世钟》、《革命军》、《苏报纪事》等革命禁书秘密推销。1904年9月,在重庆评论方什(今重庆对面)麦家院正式创办《重庆日报》,宣传革命,痛揭清王朝腐败,成为重庆最早的革命报刊。曾转载《苏报》题为《老妓颐和园之淫行》消息,矛头直指慈禧太后。同时卞小吾还集资在通远门外兜子背创办了东华火柴公司,在黄桷街创办了东文学堂,在培德堂开办女工讲习所,从经济、教育多方面鼓动革命。1905年4月29日,清廷重庆府逮捕了卞小吾,5月28日押解成都囚禁,出版了八个多月的《重庆日报》被查封,火柴公司、学堂、讲习所亦陷于停顿。狱中三年,卞小吾坚贞不屈,继续撰写了《救危血》、《呻吟语》等文章,慷慨激越,传诵一时。1908年5月15日,被四川总督锡良秘密杀害。1912年,中华民国追赠他为“辛亥革命烈士”。

(三) 辛亥革命中的重庆独立和蜀军政府

1905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重庆青年童宪章、陈崇功等首批加入同盟会,并代表重庆杨庶堪、朱子洪、牛必谦等人入盟。1906年初,同盟会重庆支部成立,杨庶堪为盟盟,1909年,杨庶堪任重庆府中学堂监督,张培爵任学监,朱之洪、向楚等任教员,聚集大批同盟会员宣传革命,为武装起义作准备。朱之洪利用其袍哥世家的威望游说巴县各场镇公口舵把子支持起义,张培爵、杨庶堪利用供学生军事训练的200支快枪进行军事训练,巴县中学、川东师范学堂、巴县女子师范、重庆教育会等单位的领导权均控制在重庆同盟会支部手中,“教职半党人”。熊克武领导的成都起义失败后,清廷端方令李湛阳组织巡防军,杨庶堪利用与李的姻亲关系,介绍大批青年加入巡防军,暗中控制了这支武装。1910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11月5日,夏之时在龙泉驿率六个排警师起义,东进南下中未及十日,发展到一个团,至合川又促成合川起义。义军到达江北黄桷镇,杨庶堪派朱之洪等前往联络欢迎夏部入城参加起义游行。11月22日,杨在朝天观主持三千人市民大会,川东道朱有

基闻讯潜逃,重庆知府钮传善、巴县知县段荣嘉被迫缴印投降。重庆宣告独立,结束了清政府统治。次日组织蜀军政府,张培爵任都督。夏之时任副都督、杨庶堪、朱之洪任高等顾问,向楚任秘书长。改大清银行为大汉银行,朱之洪任行长。袁世凯叛变革命,杨庶堪、熊克武讨袁失败,流亡日本;张培爵于天津被捕,1915年3月被袁杀害。袁暴死后,朱之洪等集资将张灵柩迁葬家乡荣昌,并在浮图关建先烈墓园。1943年,国民政府为纪念他们的贡献,将原炮台街改为沧白路(杨庶堪字沧白),在沧白路建立“张培爵烈士纪念碑”,并在重庆建立“四川革命先烈纪念碑”,“杨沧白先生纪念馆”(现重庆市政协)。

(四) 余栋臣张桂山大足反洋教和起义反虜

1890年,余栋臣在大足反教会组织武装起义,捣毁天主教堂,杀死法国传教士,1898年,在荣昌被清军捕监。张桂山等集合余旧部200余人疾驰荣昌劫狱救出余栋臣,再次武装起义,张为先锋,逮捕了法国司铎华芳济,又击败重庆前来进剿的清兵,威名远震。武昌起义前后,张桂山组织大足保路同志军攻打县城,知县朱光谦逃遁。又率众数千人经荣昌抵富顺,自称都督,制止兵乱,深得群众拥护。后接受蜀军政府收编时被滇军袭击,逃回大足为陆军周骏师顾问,又遭人构陷,含冤被杀。

(五) 温朝钟组织“铁血会”黔江起义

黔江土家族人温朝钟1907年加入同盟会,在黔江“风俗改良会”宣传革命,操练武术;1910年又将原“铁血会”改为“川鄂湘黔铁血联军”,于1月30日宣布反清武装起义,攻占黔江县城,捣毁天主教堂,开监释放无辜。清廷调四省军队围剿,激战五昼夜,带十人突围得出,又遭伏击,全都壮烈牺牲。但却揭开了辛亥革命反帝反清的序幕。

(六) 廖树勋长寿起义

1910年,同盟会员廖树勋在长寿县林庄高等小学任体育教习,组织学生操练军事,11月18日拂晓率四名学军直奔衙门知县卧室,廖双手各举一枚自制炸弹大喊“缴枪不杀”,吓得门卫缴械,知县交印投降,长寿县成为四川最早独立的县之一,有力地支持了重庆起义。廖被推选为总司令。又率众东征梁平,被内奸出卖中弹身亡。长寿人民悲痛不已,召开了追悼大会。后来内奸被革命军抓获处决,祭奠烈士忠魂。

十、陪都及红岩文化

1937年“七七”事变,日寇侵华,8.13日淞沪抗战失利,11月20日国民党政府宣布迁都重庆,12月1日国民政府开始在渝办公。1938年6月起国民党驻武汉党政军机关陆续迁往重庆;10月,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设立在机房街70号。到1938年底,全国各地迁入四川的工矿企业共计245家,90%在川东重庆巴县一带。重庆成为战时全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中心。此时世界反法西斯盟国先后在重庆设立大使馆:苏联大使馆在今重庆第三人民医院办公室;英国使馆在今鹅岭公园办公室,后迁南岸上浩马鞍山四号;美国使馆设在曾家岩(今中山四路小学),后迁两路口今急救中心处,再迁南岸今社院;法国使馆先后设在今工商局托儿所、健康路1号工人医院住院部和李子坝建设新村151号;荷兰使馆设在南山汪家花园;比利时使

馆设在今南岸建设岗90号;澳大利亚使馆设在今鹅岭公园办公室处;加拿大使馆设在长江顺城街英美法,后迁今枇杷山53号;墨西哥使馆设在今重庆宾馆方楼;土耳其使馆设在今鹅岭盆景园;印度驻华专员公署设在今临江路67号。美国陆军总部设在曾家岩今六中教学大楼;美军总部司令史迪威将军住地在嘉陵新村3号;美国高级顾问团和马歇尔别墅草亭在今黄山干部疗养院莲青楼和草亭;美国新闻处设在两浮支路208号(今市教委内);美国罗斯福图书馆即今重庆图书馆阅览室。重庆成为盟军反法西斯远东指挥中心。抗战胜利后,重庆仍定为永久性陪都,并被联合国列为反法西斯战争四大圣地之一。

陪都文化遗址有十余处

(一) 红岩村革命纪念馆

是抗战时期中共南方局和十八集团军重庆办事处旧址。1938年,周恩来任南方局书记,与董必武、叶剑英、邓颖超、林伯渠、吴玉章、王若飞等同志在此开展爱国统战工作。抗战胜利后,1945年8月28日国共谈判时,毛主席也曾住在此。

(二) 周公馆

在曾家岩50号,是抗战时期周恩来以个人名义租下的办公地点,经常在此会见各界人士和中外记者,二、三层楼分别有董必武、叶剑英的办公室。

(三) 桂园

在渝中区中山四路65号,是国民党上将张治忠的公馆。1945年8月,毛主席来重庆国共和谈时,张特地腾出作为毛泽东办公、会客和居室。“双十协定”曾在此签订。

(四) 梅花山张自忠将军墓

在北碚金刚碑乡梅花山上。张自忠“九一八”事变时驻守华北,喜峰口战役血战七昼夜,大败日军,震惊中外。“七七事变”后曾遭溃进犯临沂的日军坂垣师团,参加徐州、武汉会战,均告捷。升33集团军总司令。1940年4月在襄樊与日寇三力遭遇战中壮烈牺牲,葬于重庆。国民政府追授为陆军上将,中共在延安为之举行隆重的追悼会。

(五) 蒋介石官邸

抗战期间,蒋在重庆黄山建有云岫楼、松厅;在曾家岩德安里101号103号和歌乐山建有官邸。此外在巴南花溪小泉是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蒋兼任校长,今小泉宾馆1号楼是当年蒋介石校长官邸,陈果夫任教育长,也建有“春风楼”别墅。

(六) 林园

原是为蒋介石建的官邸,建成后蒋送给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居住,故称“林园”。1943年5月,林森因车祸去世后,蒋又将林园扩建为四号楼,蒋与宋美龄住一、二号,三号为办公会议用,四号为林森原住楼。1945年国共和谈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曾住此两夜。

(七) 孔祥熙公馆

在南温泉虎啸泉一侧,楼台廊阁十分考究。1958年曾受斥貌修复,馆内有孔氏原用实物和宋氏三姐妹史料照片等。楼侧有防空洞,古侧附近有练兵场和孔二小姐旧居。

(八) 国民政府旧址

在上清寺国防部路(今人民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设在储奇门(现重庆日报社) 因避轰炸,故行政院设在歌乐山,法院设在中梁山,教育部设在青木关,内政部设在陈家桥等市郊

(九) 陪都三机场

白市驿机场,时为美国军用机场;九龙坡机场是政界机场,在今铁路分局九龙坡机务段处;民用机场在今长江大桥下珊瑚坝公园。

(十) 宋庆龄基金会

在两路口新村3号,宋庆龄1941年在渝租赁居室。1942年她在重庆重新组织“保卫中国同盟”中央委员会,继任主席。“保盟”总部即在此办公。在这里她多次组织了国内外的捐赠资助活动,曾资助延安托儿所、河南、广东灾民和重庆儿童福利事业,多次为《新华日报》题词,鼓励抗战。

(十一) 韩国临时政府

1938年春—1939年春,韩国临时政府派驻代表和重要成员金九等人到重庆,临时政府先在綦江沱湾镇,1940年9月后迁今巴南区花溪乡,同时在七星岗今和平路二巷5、6、7号和莲花池38号作为行馆,1945年迁此办公。1940年9月,韩国光复军举行成立典礼,总司令部设在郛容路37号。1942年5月韩国临时政府改朝韩义勇队为光复军一支队,支队总部设在南岸大佛寺。1939—1940年间,朝鲜各党派多次为民族统一开会协商,直至1940年9月才组成各党派联合的第十五届临时政府,金九(韩国独立党)任主席,李始荣等七人任国务委员,车利锡任国务秘书长,赵珉儿、赵素昂、曹成煥、李始荣、朴纯、李承晚、柳东悦等任各部部长,李青天、金若山任光复军正副总司令。

(十二) 歌乐山烈士陵园

在重庆沙坪坝区歌乐山下。1943年5月在此成立“中美合作所”,国民党军统局长戴笠兼主任,美海军情报部梅乐斯任副主任。抗战胜利后,这里成为关押共产党和进步人士的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中共川东特委军事委员车耀先,中共重庆市委地下党联络员江竹筠等地下党员和陈然等党外进步人士共300多人先后在这里惨遭酷刑,英勇就义。著名的爱国将领杨虎臣将军及其儿子杨拯中、女儿杨拯贵,秘书宋绮云夫妇和九岁儿子宋振中,副官阎继明、张醒民,均在这里惨遭秘密杀害。直到1949年重庆解放,才在松林坡戴公祠地下发掘出杨虎城尸体,次年1月15日,重庆各界千人集会追悼杨虎城及其它300多名在中美合作所殉难烈士,刘伯承、邓小平等领导亲临追悼会。重庆市政府在此建立歌乐山烈士陵园作为永垂不朽的纪念。

(十三) 陪都抗战与革命文艺

1938年重庆作为战时首都后,大批文艺工作者先后来到重庆,创作了大量的进步文艺作品。郭沫若创作了历史剧《屈原》、《棠棣之花》、《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散文《银杏》和史论《甲申三百年祭》等;茅盾发表了著名散文《白杨

礼赞》;小说《霜叶红似二月花》;剧本《清明前后》和大量杂文,并与郭沫若领衔向重庆文艺界312人于1945年2月联名发表《文化界对时局的宣言》,要求废除检查制度、停止特务活动、保障人身自由等;著名作家老舍在重庆创作了四幕话剧《张自忠》、喜剧《面子问题》、话剧《谁先到重庆》、《虎啸》、《桃李春风》和长篇小说《火葬》、《四世同堂》中一、二部、《惶惑》、《偷生》、《民生世界》等和长篇回忆录《八方风雨》;冰心发表散文集《关于女人》16篇;洪深创作四川方言话剧《包得行》及《黄白丹青》、《女人女人》、《樱花晚宴》等话剧,导演了《法西斯细菌》、《祖国在召唤》、《春寒》、《草莽英雄》,出版了导演理论专著2部;夏衍创作了《山乡吟》、《法西斯细菌》,与人合写了《戏剧春秋》、《再会吧香港》、《草木皆兵》、《离离草》、《芳草天涯》、《复活》和电影剧本《风云儿女》;阳翰笙创作了五幕历史剧《天国春秋》和《草莽英雄》、《两面人》、《梅花之歌》等剧本;胡风在重庆主编文艺刊物《七月》和《七月诗丛》,发表了文艺评论数十篇,出译文、杂文、评论集四种;冯雪峰主编了《抗战文艺》,发表了《乡风与市风》杂文集;巴金在重庆创作了《憩园》、《寒夜》、《第四病室》等小说;靳以在重庆创作了《众神》、《乱离》等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前夕》;艾青在重庆出版了长诗《火把》,又创作了《旷野》、《夜》、《高粱》、《老人》和长诗《溃灭》的部分章节;曹禺创作了《蜕变》、《北京人》等话剧,又将巴金长篇小说《家》改编为剧本;吴祖光创作了《风雪夜归人》、《牛郎织女》、《神夜奔》等剧本;何其芳在重庆创作了《星火集续编》四辑杂文集;张恨水在重庆创作了中篇小说《八十一梦》;梁实秋在重庆创作《雅舍小品》34篇,江津诗人吴芳吉创作《婉容词》、《两父女》、《巴人歌》等。画家丰子恺在重庆创作了《纤夫》、《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等画作,出版了《子恺漫画集》;张大千在重庆创作了《忠心报国图》(又名《双骏图》),与晏济元联合举办抗日募捐画展80余幅,以赈济难民,1944年在重庆举办了“张大千临摹敦煌壁画展览”;徐悲鸿创作了《巴人汲水图》、《贫妇》、《风雨鸡鸣》、《自画像》、《月夜》、《群马》、《六马图》,并多次主办了画展。此外影剧界夏云瑚在重庆经营“国泰大剧院”,与成都联合组建了“长江影片公司”,又从上海组成“上海影人剧团”带回重庆,演出和放映了大批抗战话剧和进步影片。新闻界除《新华日报》社外,陈望道在夏坝复旦大学还创办了《中国青年学导报》,并带头募捐创立了“新闻馆”、“复新通讯社”,被誉为“夏坝的延安”。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在合川创办育才学校,在重庆创办了“社会大学”;“世界平民教育之父”晏阳初在北碚创办了“中国乡村建设学院”;梁漱溟在北碚创办“勉仁文学院”;马寅初在重庆大学创办了商学院;张伯苓在重庆创办了“南开中学”等等。此外科学家茅以升、梁思成、侯光炯等,实业家卢作孚(民生公司)、吴蕴初(味精大王)、孙越崎(天府煤矿)、胡仲实(实业公司)、胡子昂(自来水公司、水泥厂、机器厂等)、吴羹梅(铅笔厂)、包玉刚(广矿银行)、古羹虞(猪鬃大王)等,均为陪都物质文明做出了贡献。